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十)

(解放军)
胡居成

继续受王明路线影响

叶挺离军出走之后,项英比过去更加忙碌了。

项英明确认识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中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党的组织系统来贯彻执行,今后不管是国共两党派谁来当军长还是自己当军长,新四军的担子仍像过去一样,责无旁贷地由自己来挑。

项英也明确认识到,新四军这副担子越来越重了。由于新四军在敌后迅速打开了局面,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使日军感到震惊和恐慌。为了保护南方作战的战略据点和交通枢纽南京、镇江不受新四军威胁,确保京沪线、京芜线和长江交通畅通无阻,日军改变了原来对新四军的蔑视态度,9月初,将新调来华的第15师团、第17师团、杭州地区的第116师团和东北的伪满军5000余人,增调至江南,使京、镇、芜地区的兵力由三个联队增加到三个半师团,还不惜放弃宣城、溧阳县城,收缩兵力,修据点,筑公路,组成“梅花桩”式的据点群,力图缩小新四军的活动地区。并抽调兵力,对新四军游击区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战术;在江南,以茅山、小丹阳为进攻中心;在皖南,以青阳为进攻中心。9月1日,日军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天王寺等据点调集2000余人,分五路包围第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前隍村;12日,又分三路进攻蒋野桥;15日,又分两路进攻上兴埠、溧水;10月7日,进攻北镇、新王庄,并放火烧茅山。在第二支队活动地区安徽当涂县小丹阳,日军集中4000多人,在20架飞机的掩护下进行第一次大“扫荡”,侵占小丹阳后,又向朱门进攻。在皖南,日军集中1000余人进攻贵池、铜陵,并分三路进犯青弋江。在江北,日军调集舒城、桐城、六安等数千兵力,几百辆汽

车、装甲车,向第四支队的活动地区进行连续“扫荡”。……

在日军向新四军游击区大举进攻的同时,被新四军对日作战胜利惊动了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战区和第五路军属下的“忠救军”、保安团等,也在各处袭击新四军,我新四军处境非常险恶。

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受到了批评和纠正,长江局已被撤销,王明改任中央统战部长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身在延安,亲自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受王明的影响却没有得到认真清理。他仍然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看成是“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针”,提出“最忠诚的拥护蒋委员长……只要坚决在委员长领导之下,巩固团结,巩固统一,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们的。”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问题。可惜项英没有听到,他已于10月2日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回皖南了。

项英回皖南军部后,在短短的12天内,先后召开了军部、东南分局(11月改为东南局)机关干部、军分会和军部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他所了解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肯定了党中央遵义会议以来路线的正确,总结了抗战以来15个月的经验。在传达中继续宣传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观点,使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离党中央正确方针的做法。

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项英发来电报,并要项英转给周恩来、叶剑英。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张云逸率部过江活动的问题。电文中说:“白崇禧已允许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

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曾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滁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徐州失守后，叶挺认为第四支队在庐（江）合（肥）无（为）三县之间，由于地形条件限制不利迅速展开，要求部队挺进至涂县、全椒以西，嘉山、明光以南，巢县以北、定远以南地区作战。由于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存有顾虑，行动迟缓，中央军委考虑张云逸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广西也做过工作，在广西人民中有一定威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都是广西人，派张云逸率部队过江东进皖东，可能较好通过。于是7月中旬，叶挺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请求，派张云逸率一个营去江北开展游击战争。白崇禧允许后，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回香港，这事就搁置起来。11月10日接中央电报当天下午，项英召集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赖传珠列席）开军分会，研究去江北和四支队的问题。

问题的症结主要有两点：一是带多少部队去江北；二是去江北的主要任务。项英认为，叶挺在的时候，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申请只去一个营，军委会未作任何更改，也未提任何条件就“照准”，这是对新四军的信任。如果我们言而无信，多带一两个营去，一旦军委会追查起来，我们就不好交待，失去信任，影响团结抗战，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统一战线大局啊！

袁国平和周子昆感到项英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也考虑到，派两至三个营过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最有权威的毛泽东、王稼祥和新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提出来的，也不是轻易就可拒绝的。他俩考虑再三，一时无所适从，所以都低头不语吸闷烟。项英见大家都不言语，又说：皖南抗战形势是愈来愈紧张了。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妄图侵占沿江诸要地，把我军歼灭或赶走。皖南虽然不是敌人主要战略进攻的目标，但皖南处在侧江侧敌的位置，它不仅具有屏障浙赣的重要性，而且有控制与威胁敌人长江交通命脉、造成以后我反击优势的积极作用。顾长官下决心要扼守皖南。可是，我军在皖南的力量实在太弱了，只有三支队五团和

六团三营在与日军作战。现在看来能抽出去江北的只有一个特务营。

作为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的张云逸也十分清楚，从完成三战区交给的防御作战任务来说，三支队不仅不能往外抽人，还要增加力量才对。现在能和日军较量，全凭干部战士勇敢不怕死。他体谅项英的苦衷，说：“那就按项英同志说的办，我先带特务营去江北，以后如能抽出部队，再跟进吧。”

袁国平、周子昆也表示同意。

张云逸率特务营过江巡视的主要任务：推动四支队东进皖东，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从原则上讲，项英没有意见，他在徐州失守后，也曾多次致电四支队，要他们向东发展，东进皖东敌后。时过三月，项英对四支队东进方针虽然没有变，但在具体要求上却变了。他说：“我们去江北的主要工作，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为主，求得各方面合作和配合，以便我军辗转减少阻碍和限制。对行政采取多方赞助。对地方武装采取帮助扶植，勿用直接吞并办法，以免造成政府、地方与我对立。民运应随军事的发展以合法的合作方式为主。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

张云逸对项英的这些具体“指示”从内心讲，是不同意的，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团结抗日，不能向国民党无礼要求让步、屈服，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求巩固、求发展。但他没有和项英争论，只是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皖东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南北相互联系的枢纽，又是大别山区的前卫，津浦铁路纵贯其中，如果控制了皖东，便能破坏敌人的交通，威胁南京、徐州、蚌埠。皖东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啊！可惜我们去晚了，再不抓紧东进，我将更加被动。”张云逸看袁国平、周子昆向他点头表示同意，端起杯子喝一口水说：“苏南江北所以和国民党产生摩擦，主要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弱。在江北，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10万人，国民党就不敢和我们摩擦了，廖磊反过来什么事情都要向我们请求了，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哈哈……”袁国平和周子昆都被张云逸的诙谐谈吐引得笑起来。项英没有笑，他为张云逸过江可能影响和国民党的团结抗战而暗暗不安。

（责编 启元）